

夏東元著

鄭觀應

廣東人民出版社



夏東元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鄭觀應

嶺南文庫編輯委員會

廣東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

合編



责任编辑：曾宪志

封面设计：智 达

郑 观 应

夏东元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岭南文化发展公司排版

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4插页 270,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218-02094-1/K·466

定价：平装22.00元 精装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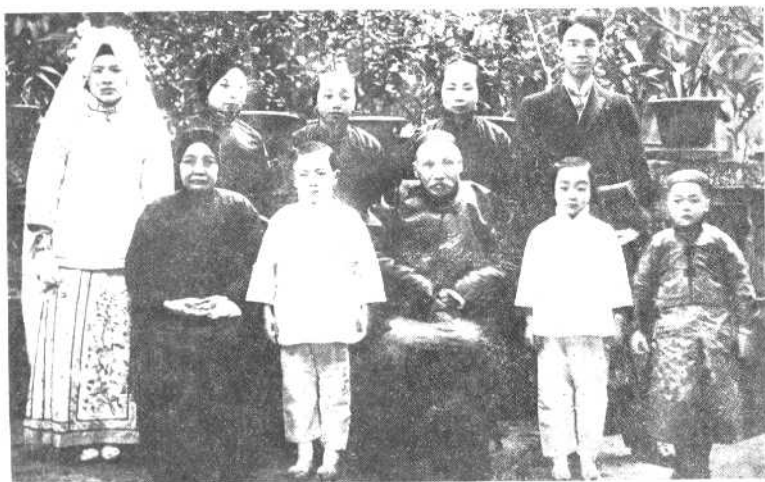


郑观应
(1842—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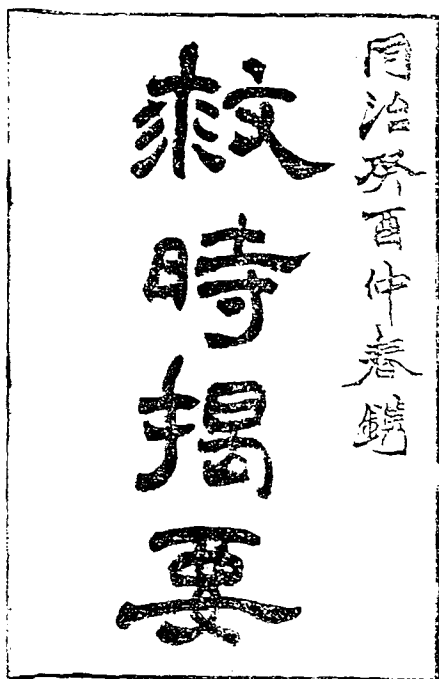


郑观应 80 岁生日留影

郑观应全家照



1873年《救時揭要》木刻本內封



1895年十四卷本、1900年八卷本的《盛世危言》內封

中华印务总局刊行的
三十六篇本《易言》內封

光緒庚辰
夏中華印
務總局



毛泽东读过的
《盛世危言》和他
亲笔书写的“还书
便条”



毛泽东
读过的
《盛世危言》
增订新编
还书便条

此信先生有通款者昨前午京兆至通人信字想通
金鹿碑青刊海版五月二十日所寄

于谕敬答

随在安知至以万望而通款是天落已概託恩友代
購便到字呈官印前晚赴津寓于金三客寓寄書及
回而手稿石下君手至得之云如蒙

電報願即寄還一通如石下君前晚時該局報照
其安客所有藥債所有藥債所有藥債所有藥債
謀有藥買物有藥買物有藥買物有藥買物有藥買物
紐真可若數十萬之計而經有寄書事信信現信信
信信此者創舉抗阻合王場為客所及實謀之參集
外軍所任選胡行方准後報此則所是甚能由以

小輪船昨經于揚安備招人投標施安也如信信
如前時有應外藥安難些銀票皆現日有起色既
便現值百十兩以發報底莊諸如若有寄書及政府
出價制下若而通便公款代選限在奉陽可必曰

價每或百兩不若法之否則該法招人包辦以五年為
期其前失後限亦退息一五年後改回自亦
此外別座良法誠如所云非僅則相收利制一事
而中人自不願其一如情照時之甚如某也據乘法

言誠知建在財里仙前請匠一新板 報因於發同
性合之學力源理誠對天不計可保 示前非一視
世不防有同報信不覺其亦非有夏 敬請
通安不修 門下士官區誌樂 五月四日

郑观应于1912年写给盛宣怀的亲笔信

岭南文库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选平 卢钟鹤 任仲夷 杨应彬 杨资元
李兰芳 陈越平 林 若 黄文俞 黄华华
谢 非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编：黄 浩

主 编：于幼军

副 主 编：刘斯奋 岑 桑 (执行) 萧如川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幼军	卞恩才	冯伯秋	庄 昭
刘扳盛	刘斯奋	朱仲南	李权时
岑 桑	张 磊	陈俊年	陈胜彝
洪志军	胡守为	饶芃子	梁 钊
萧如川	曾牧野	曾宪志	廖晓勉
颜泽贤			

“岭南文库”前言

广东一隅，史称岭南。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的历史长卷增添了绚丽多彩、凝重深厚的篇章。

进入 19 世纪的南粤，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摇篮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启蒙之地，继而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和根据地。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斗争中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用鲜血写下了无数彪炳千秋的史诗。业绩煌煌，理当镌刻青史、流芳久远。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摧枯拉朽，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卓有建树。当中国社会跨进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全新的历史阶段，广东作为国

家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省区,被置于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发展的前沿,沿改革、开放、探索之路突飞猛进;历十年艰辛,轰轰烈烈,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空前伟绩。岭南大地,勃勃生机,繁花争簇,硕果累累。

际此历史嬗变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有必要进一步认识岭南、研究岭南、回顾岭南的风云变幻,探寻岭南的历史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岭南。我们编辑出版“岭南文库”的目的,就在于予学人以展示其研究成果之园地,并帮助广大读者系统地了解岭南的历史文化,认识其过去和现在,从而激发爱国爱乡的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高瞻远瞩,继往开来。

“岭南文库”涵盖有关岭南(广东以及与广东在历史上、地理上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岭南地域)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资源和人物传记等方面。并从历代有关岭南之名著中选择若干为读者所需的典籍,编校注释,选粹重印。个别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译著,亦在选辑之列。

“岭南文库”书目为 350 种左右,计划在五至七年内将主要门类的重点书目基本出齐,以后陆续补充,使之逐渐成为一套较为齐全的地域性百科文库,并作为一份有价值的文化积累,在祖国文化宝库中占一席之地。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元旦

前 言

郑观应（1842—1922 年）^{〔1〕}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他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在 19 世纪 90 年代刊行后，在思想界、学术界乃至政治、经济各界，都引起强烈的反响。不仅戊戌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等人受到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非常喜欢郑氏的《盛世危言》。1936 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回忆说：由于父亲只准读孔孟经书和会计之类的书籍，所以“在深夜里把我的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见灯光”，才读完《盛世危言》；又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2〕}郑观应及其《盛世危言》有如此大的魅力和吸引力，绝非偶然。这主要因为郑氏的思想核心是“富强救国”，是通过社会改革把中国从落后变为先进，从封建主义推进到资本主义，也就是要变贫弱的中国为富强的中国。

郑观应的“富强救国”主张涉及的层面甚广，除经济上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政治上变专制为民主这个核心内容外，在他的著作中，对女教、女权、社会慈善福利、社会风气的改造，乃至流民和犯人通过劳动教养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都有论述。这里主要围绕他的思想“核心内容”加以阐述。郑观应在他丰富的社会实践、特别是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他对自己的思想体系曾作过如下表述：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这几句话虽是郑观应于1909年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说的，却是他50年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他大半生大量著述的思想结晶。在这里，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任务，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郑观应出生于1842年《江宁条约》签订之前一个月，17岁那年（1858年）走上社会就业时，正是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兹后几十年，他经历了庚申之变、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重大的屈辱事件，目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和中华民族濒临被瓜分的惨祸。处于这种形势面前，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任务，这是他爱国御侮热情的表现。

“攘外”靠商战，还是靠兵战？郑观应认为，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本”，即他所说的“商战重于兵战”，绝不能“舍本而求末”。他从商战这个基点出发，提出了建立工业体系以保证商战胜利的见解。

要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商战，必须要有强大的工业作为后盾，即所谓“有工以翼商”。因为商战必须要有丰富而又价廉物美的商品，而这只有发展近代工业才能做到，否则商战就是一句空话。要使商品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取决于先进的机器技术的使用。郑观应是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他很注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进先进的机械装备。为了不受外国人的挟制，单靠购买和引进机器技术是不行的，必须自己能够制造这些机器。郑观应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即提出设专厂制造民用机器。

单靠在工厂里使用先进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一定能使商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市场和到达消费者手中。郑观应明确认识到，必须要有新式的交通运输和电讯设备，才能降低运费和了解商情。所以，他十分重视发展近代航运业、铁路、电报等事业，并对发展这些行业的意义和办法有比较合乎科学的说明。为了同一目的，郑观应又建议废厘金，减税收，享受与洋货同等的轻税免税的权利。这还不够，要发展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必须具备动力、原材料等条件。于是郑观应又提出大力发展煤炭、金属的采掘和冶炼等工业。为了使工商业顺利发展，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他主张自己

创办银行，以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加快周转，他的“银行为百业总枢”的认识是深刻的。

可见，郑观应为了操商战的胜券，对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都有周密的考虑和措施。但要把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办好，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和技术人才，否则“借才异域”，不仅要受人挟制，且工薪很高，增加了产品的成本。所以郑观应不断地大声疾呼，把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放到很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见，郑观应关于商战的思想体系是完整的。他认为，只有发展近代工商业并在同外国资本主义商战中获胜，才能达到富的目的；只有富，才能真正的强。不但在经济力量上说是如此，而且从军事技术上说也是如此；整个工业水平提高了，军事技术才能更高。他写道：

“我国亟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才，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以之通商，则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诸宫中也。此国富民强之左券也。”

这些话说明，军事技术的提高取决于整个科学技术和工业水平的提高。郑观应认为，不注重商战而单搞兵战是绝对不能强的，即使强也是表面的。他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恃。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

郑观应不是单纯的实业救国论者，他是很注意政治制度改革。他经过几十年的社会实践尤其是经营工商业的实

践，深切地体会到，工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在这个制度下的政权，必须是对新式工商业支持、能代表商民利益的。因此，它必须是有商民代表参加的有一定民主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郑观应认为，如果政治不改革，仍然保持封建专制政权，就一定会扼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工商业受到摧残。因而他于19世纪70年代就提出实行君民共主的议政制，即稍后明确提出的君主立宪制度。这个制度是承认君权前提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当时如能实行，不失为一种比较适应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制度。这里表明，郑观应已知道政治对于经济的阻碍和促进的作用。他说：“宪法乃国家之基础，……政治关系实业之盛衰。政治不改，实业万难兴盛。”必须像西方国家一样，“商人得参与政权，于是人民利益扩张，实业发达”。郑观应非常强调要有“治人”，以制订适合工商业发展的“治法”。有了“治法”，还必须有执行“治法”的人。这就是说，这个“治人”，既是“治法”的制定者，又是“治法”的执行者。他说：“有治人而后有治法，有治法必须有治人。二者不可须臾离也。”这里所讲的“治人”，当然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制“法”和执“法”，都必须具有新的资产阶级知识的人才可能办好。如果一脑袋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怎么可能制订出资产阶级的“治法”？又怎么可能贯彻执行资产阶级的“治法”？欲新“治法”，先新“治人”。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据上所述，郑观应是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

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的。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民主与科学。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两面旗帜。它是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在摸索富强道路上的正面和反面经验的总结。郑观应则是在这正、反经验中亲历其境者。在他的脑子里已孕育了民主与科学思想的胚胎。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魏源已开始有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萌芽了。他提倡“师夷长技”，创立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他说，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一样，用科学技术“夺造化，通神明”，“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3]。应该认为，这是企图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改造中国的开端。魏源在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对于西方民主制度也是憧憬的。他很称赞美国的大总统“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的公举制度；对于美国“议事诉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4]的制度，也表示羡慕。这实际上是对民主制度的肯定。魏源虽然没有、也不敢说出中国的君主专制不若美国的共和制，但他对美国“以部落代君长”的联邦民主制却给予了“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的称许。

大约与魏源同一时间，其他立志改革者也对技艺与民主的问题有所阐发。例如，1844年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8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有表述。梁廷枏说，英国

用蒸汽机于火轮船和火车，“驶行特速，可省运费”；而“纺车织具，并以水火力代之，机动而布自成，故制成多而用力省。”^[5]徐继畲在谈到法国工艺精巧时，特别强调科学技术不断前进的优点，他说：“其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表。”^[6]这实际上是反映资本主义竞争特征的论述。梁、徐在技艺之外，对美国的民主制都是赞许的，并比魏源有所发展。梁廷枬说：“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故“终未尝以人变法”。他称赞总统制的优越性说，总统“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这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届期必退，既不能恋栈不走，又不能自定接班人，这就防止了终身制，也防止家长式的偏见。所以梁廷枬赞道，中国古代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了。梁廷枬又进一步论证这种制度的好处还在于促使总统努力工作，力求在短短的任期内加快步伐有所作为，他说：“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复当前之悚，斯已耳。又安有贪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美国总统不可能是尸位素餐者流。梁廷枬的结论是：由于美国法治而非人治，政事“一公之民”，故此制度比较健康，“是以创一开辟未有之局，而俨然无恙以迄于今也”^[7]。

冯桂芬对西学的论述要比魏源、梁廷枬等人具体得多，